

在利用山地資源時往往依賴國家為協力廠商背書來解決利益矛盾。

本書尚有進一步拓展之處，一是本書對外來人群的山場開發與確權活動的討論有待進一步展開。正如作者在結論部分所言，閩浙贛皖山區的山民作為外來人群，與當地居民圍繞山場產權，發生了大量的紛爭。因而，在思考山場產權觀念和秩序時，還需關注外來人群確權的途徑與方式及其對山場原有秩序的影響。雖然作者在後記中提到了「山裡人的故事」，但林先生和陳先生的父祖同為外來人群，為何林先生能夠成為本地人，陳先生卻因沒有族譜而被迫搬到別的村莊，做了九姓漁戶，這是否與林先生家族與當地最早定居的葉姓家族與方姓家族的姻親關係有關。倘若作者對此進一步探究，或許可以揭示村寨組織、宗族形態和婚姻網絡對山場產權秩序的影響。此外，本書關於流動人群對山場確權的影響，亦有意猶未盡之處，以商人為例，山地林業資源豐富，吸引着大量從事山林經營活動的商人前來，而商人及商本的流動性影響着山場的權利秩序乃至社會結構。

張藝鑫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

羅安平，《戲臺與相機：美國〈國家地理〉與中國西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352頁。

長久以來，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庫克船長「發現」南方大陸等話語，無不充斥着我們的所見所聞，理所當然成為了一套既定的「世界觀」。原本棲居當地的人就成了「被發現者」，然而，撇開這些充滿「發現」的話語，我們恍然大悟：當地的「被發現者」才是真正的「發現」者，原本的「發現」只能算「記錄」而已。由此，引出羅安平所著《戲臺與相機：美國〈國家地理〉與中國西南》（以下簡稱《戲臺》）的討論核心：不應以歐洲或西方中心論為出發點看非西方世界。

《戲臺》是羅氏在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此書曾以名為《杜鵑花與弓弩手：民國時期美國〈國家地理〉的中國西南》於2016年在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後，經7年時間的增補與打磨，《戲臺》終於問世，這也是羅氏對其研究區域，即中國西南長期耐心耕耘的可喜結果。作者之所以關注「西南一隅」，主要理由有四：一為四川是東西方文明

相遇與交匯的重要場所，二為四川是自身內部是多元文化的碰撞地，三為四川是典型的生態熱點地區，四為作者羅氏也是四川人。由此，中國西南是考察西方人看中國的重要視點，亦可通過當地學人的視角反思西方「中國觀」，形成一種有益的複調。（序）

美國《國家地理》可說是西方人看世界乃至中國的重要範本。其內容主要包括文字、圖片與地圖，均是作者親眼所見或現場實錄，具有較高可信度，而且考察內容廣泛，描寫細緻，還有很多測量資料，有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此雜誌於1888年創刊，此後每月一期，每期論文4至8篇。發行量多年居美國前列，甚至被冠以「美國的世界鏡頭」等稱號。（頁23）《國家地理》對中國的報導較遲，1892年才有一篇。1900—1909年是報導中國最多的時段，有44篇。1960—1969年是報導中國的低谷期，有6篇。（頁56）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開始正常化，《國家地理》與中國「喜重逢」，並共迎「新千年」（頁63）。其中，就有不少關於中國西南的探險故事。本書的楔子頗有意思，是以1909年美國地質學家羅林·錢伯林在都江堰附近拍攝的一張當地農民看戲的照片開始論述，將此時中西文化的相遇喻為「戲臺遭遇相機」，結果是戲臺無力吸引觀眾，觀眾均轉向相機。這種不平衡似乎暗示中西文化間的理解與尊重必定充滿荊棘。為此，作者以「植物採集」「西南道路」「生態文明」「多樣族群」為主綫，依時序串成整體，揭示《國家地理》中「寫文化」「造歷史」與「權力生產」的過程。正如該雜誌最著名的一幅肖像——阿富汗難民女孩古拉，是配合美國政府「重建」阿富汗的權力設置。

在「植物採集」中，作者羅氏一方面呈現3位「植物獵人」福里斯特、威爾遜和洛克眼中的西南生態與人文，另一方面揭示西方帝國擴張與殖民的背景，進而對中國本土學問進行了掩蔽，造成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知識譜系中「失語」。在「西南道路」中，背夫、溜索、藤條橋、墳場、農民、水牛與石板路等，讓外國探險者感知一種「東方氣質」。但隨着機車時代的到來，東方氣質也將消失。不過，率先出現的是1940年代的滇緬公路而非機車，西南被塑造成「新西南」，人們開始以西南為中心看四周，不再將其作為邊緣地區。但「新西南」或多或少帶有西方國家的影響痕跡，從中國內部認知中國尚有一定距離。在「生態文明」中，作者論述20世紀80年代的記者馬克·詹金斯到雲南香格里拉進行考察，發現與此前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中的描述不太一樣。特別在全球資本市場、全球傳媒潮流以及文化趨同中，香格里拉的神聖、嚴肅的本真性逐漸消失。此後，詹金斯認

爲，要像保護大熊貓一樣，探求人類前進方向上的多樣風景與多種可能，呼籲對生態環境與傳統文化密切關注。在「多樣族群」中，無論是傈僳族、摩梭女郎還是木里王、五彩民族，都是在人類學家所編製的意義之網，並非新的創造，甚至只有民族志者在場，「原住民」缺場。

綜言之，《國家地理》說明不同地區的受眾認識廣闊世界的人群和社會，對於跨文化溝通與對話起了重要橋樑作用。但另一方面受擴張主義、殖民主義的影響，有帝國優越感及「東方學」的影子。如以「原始」、「野蠻」等，爲「啟蒙」、「教化」的「天賦使命」製作漂亮的宣傳手冊。因此，對《國家地理》中的文字、圖片與地圖都要十分謹慎，它們並非簡單、直接的複製，而是帶有目的性的建構。最後，作者呼籲，爲平等對話，每個國家都應有自己的《國家地理》。（頁303）顯而易見，作者在整本書中都在批判隱藏在文字、圖片與地圖背後的歐洲或西方中心論，反對以此視角來理解中國。這一出發點具有很強的反思性，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羅氏認爲，地理環境決定論構成了《國家地理》早期中國形象認知中的基本底色，由此中國被視爲「停滯」與「落後」的，體現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優越感。（頁74）筆者以爲，用地理決定論理解區域社會的發展無法直接證明西方人就是傲慢並自感優越的。毋庸諱言，地理決定論是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重要理論之一，尤其在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人不能充分按照自己的意圖改變自然，地理因素當然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參見賈雷德·戴蒙德著，謝延光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人改變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地理因素的作用將逐漸削弱。因此，地理決定論與人的能動論共同構成人與自然關係的兩面一體，均是全人類理解社會發展的重要智慧。況且，地理決定論最先是在1930年代由蘇聯開始批判的，此後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跟從，不無政治因素的影響。

其次，作者在論述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時，將其在中國採集植物的經歷視爲「對中國植物資源的掠奪」（頁139）。當一支毒箭從探險隊頭上飛過，第二支毒箭又要飛來時，探險家福里斯特扣動火槍並警告「如果有誰再敢妄動，下一發子彈就會射在他身上」（頁246）。羅氏將上述解讀爲「帝國主義的征服行徑」（頁247）。筆者以爲，這些帶有明顯個人愛好、專業性質，甚至是即時的反應，輕易上升至「帝國主義」的高度是否合適？還有作者認爲「東方氣質」的逝去將使西方旅行者的優越感喪失。（頁169）之所以懷念「東方氣質」，是因這些地方能激發征服慾與探險慾。（頁100）

但「征服慾」、「探險慾」與「優越感」是不同的概念，只能說是獵奇心的喪失，無法直接證明優越感喪失。又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認為香格里拉是「人類文明的貯藏庫」，而羅氏卻言「人類文明的貯藏庫與文化動物園有何區別呢？」（頁220）理由是文化是流動的，拒絕被凝視。但這種比喻與理解是否恰當值得討論。此外，此書硬傷是無中文的報刊、檔案、地方志等史料，基本以外文《國家地理》為主。因此，也沒有真正走入「他者」，更無法從「他者」視角反觀西方，進而無法更深刻、全面地把握區域社會獨特的變遷過程。（關於這一點，人類學家華德英提出「自製模型」、「意識形態模型」與「局內觀察者模型」，對理解不同人群對區域社會發展的影響有重要借鑒意義。（參見馮承聰編譯，《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香港：大學出版社，1985）總之，作者在反思西方中心論時，不免矯枉過正，將西方人一切反應都與優越感、傲慢緊密相聯，有先入為主的書寫之嫌。

最後，作者呼籲西方尊重與理解「他者」文化，但反觀當下，不少中國的地方歷史建築、文物或文化已被城市化等浪潮「洗禮」，並生成大量讓人感到惋惜與痛苦的「記錄」。當我們在質疑西方的傲慢與優越時，是否也極大地遮蔽了自身的問題呢？不同的國家之間需要尊重與理解，同一國家內不同的文化或群體更需相互尊重與理解。正如作者所言，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滇緬公路已被320國道、昆瑞公路等取代。（頁183）換言之，我們正走向另一條道路：還沒等到「帝國主義的征服」，自己卻已把自己「馴服」了。這或許是我們更值得反思的地方。

劉金源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